

# 两晋之际诗歌研究

孙耀庆

著



東北林業大學出版社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Press

LIANGJIN ZHIJI SHIGE YANJIU

两晋之际诗歌研究

孙耀庆

著

東北林業大學出版社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Press

· 哈尔滨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451-82113295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晋之际诗歌研究 / 孙耀庆著. —哈尔滨：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2016.12

ISBN 978 - 7 - 5674 - 0983 - 5

I. ①两… II. ①孙…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研究—  
中国—晋代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15609 号

---

责任编辑：赵 侠 王翠燕

封面设计：宗彦辉

出版发行：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哈尔滨市香坊区哈平六道街 6 号 邮编：150040）

印 装：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 mm×1 000 mm 1/16

印 张：12

字 数：15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0.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电话：0451-82113296 82191620）

## 前　　言

两晋之际是指从西晋到东晋的过渡时期，是一个模糊的时间概念。本书所讨论的两晋之际，时间上限起于西晋惠帝继位，下限伸至明帝卒年，即从永熙元年（290）到太宁三年（325）这一阶段。其中所涉及的诗人的主要生活经历及文学活动在惠帝中后期到明帝时期。之所以上限起于惠帝继位，是因为一些诗人虽经历了“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晋室南渡”等重大历史事件，但其出生及成长是在短暂安定的惠帝前期，如此框定有利于更为全面地探讨重大政治变革对其人、其诗的影响。同时，对于一些寿命较长、跨代较久的诗人（如卢谌、葛洪等），本书也主要依据其活动时间来酌情处理。通过对诗人生卒年及生平经历的考察，本书重点论述的诗人有刘琨、卢谌、郭璞、杨方、曹毗、庾阐六位。

学界关于曹魏与西晋文学有正始文学研究、太康文学研究，关于东晋文学有玄言文学研究，刘宋文学有元嘉文学研究，齐梁文学有永明文学研究等，而关于两晋之际的文学研究则少之又少。事实上，两晋之际文学上承西晋文学下启东晋文学，起承上启下之作用，是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环，不可忽略。本书论述的两晋之际的诗歌是两晋文学的重要部分，其承接两晋时期的诗歌研究，对两晋文学的纵向研究具

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关于两晋之际文学的研究，无论是在整体风貌概述还是在专题个案探索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在整体上对两晋之际文学探究的著作有：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郭伯恭《魏晋诗歌概论》，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徐公持《魏晋文学史》，曹道衡《魏晋文学》，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论文集》，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张可礼《东晋文艺系年》，（日）佐藤利行《西晋文学研究》，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詹福瑞《中古文学理论范畴》，等等。

对两晋之际的诗人进行个案研究的著作和论文有：赵天瑞《刘琨集》，聂恩彦《郭弘农集校注》，连镇标《郭璞研究》，钱穆《葛洪年谱》，陈国符《葛洪事迹考证》，倪佩丽《刘琨研究》，梁建徽《刘琨死因考略》，顾农《关于刘琨与卢谌的赠答诗》，田小军《两晋河北作家简论》，姜岩松《卢谌研究》，王贞春《宴游赏玄意颠沛贵真情——卢谌诗文创作研究》，李娜《郭璞的生活与创作》，赵玉霞《郭璞游仙诗中忧患意识研究》，沈海波《郭璞行年考》，赵沛霖《驾鹤仙去：郭璞之死解读》，张可礼《许询生年和曹毗卒年新说》，郎晓斌《论庾阐山水诗的先驱作用》，杨健《别具一格的“中兴之时秀”——论庾阐诗歌创作三论》，等等。

这些研究者对两晋之际的诗人在生平、仕历、事迹的考证上有较为丰硕的成果。其中对刘琨、郭璞二人的研究尤为深入：对刘琨的研究涉及其身世、思想、人格魅力、悲剧成因等方面，对其诗歌研究涉及其诗风及与卢谌的赠答研究两方面，还有其人、其诗对后世影响的研究；对郭璞的研究涉及其生平事迹、道教思想、易学思想、人格构成及悲剧结局等方面，对其诗歌则主要集中在其《游仙诗》的研究

上。但也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焦点主要聚集在了品格较高、成就较大的诗人及诗歌上，而忽视了个别非著名作家。本书对个别被忽略的作家如杨方、庾阐给予了关注，并最大限度地挖掘此时期诗歌之意蕴。

本书认为，两晋之际文学是两晋文学的重要一环，在内容与诗风上，不仅与建安慷慨之音、正始遥深之旨、太康繁缛之貌一脉相承，而且还进一步地开阔了东晋玄言诗之道路。同时，两晋之际文学又具有其鲜明的特征，是两晋之际战乱、分裂时代环境的产物。敏感的诗人们时时刻刻都在感受着国破家亡、生离死别之痛楚，也由此形成了他们对待人生的三种态度：一是意在提高生命的质量，及时勉励与建功立业；二是延伸生命的长度，求仙访道与归顺自然；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时行乐与享受生活。第一种人生态度落之于诗歌内容上便是表现亡国的痛楚、祸福的无常、命运的难卜、生命的短暂和人生的无奈；第二种人生态度是对第一种人生态度所形成的悲怆基调的超脱，落之于诗歌内容上便是服食求仙、隐逸访道；第三种人生态度则是对前两种人生态度的有限性的补偿，反映在诗歌中便是纵情山水、闲适享乐。故此时期形成了三种主要诗歌主题，即生死主题、游仙主题和山水主题。

由此，本书力图为两晋之际的诗歌构建出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从横向与纵向两个方向论析此时期诗歌的特征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 目 录

<b>第一章</b>	<b>两晋之际的社会背景与诗歌创作</b>	<b>1</b>
一	两晋之际的政权更迭	1
二	两晋之际的世风变化	13
三	两晋之际的士人心态及走向	23
四	两晋之际诗歌概述	31
<b>第二章</b>	<b>爱国诗歌探析</b>	<b>41</b>
一	黍离之痛	41
二	慷慨之音	47
三	无奈之叹	53
<b>第三章</b>	<b>游仙诗歌探析</b>	<b>60</b>
一	仙境之游	61
二	列仙之趣	69
三	坎壈咏怀	76
<b>第四章</b>	<b>山水诗、爱情诗及其他</b>	<b>82</b>
一	山水诗探析	82

二 爱情诗探析 .....	89
三 闲适诗探析 .....	93
四 赠答诗探析 .....	96
<b>第五章 两晋之际诗歌纵论 .....</b>	<b>102</b>
一 两晋之际诗歌与建安诗歌 .....	102
二 两晋之际诗歌与正始诗歌 .....	112
三 两晋之际诗歌与太康诗歌 .....	118
四 两晋之际诗歌与东晋玄言诗 .....	122
<b>参考文献 .....</b>	<b>127</b>
<b>附录一 两晋之际诗歌研究综述 .....</b>	<b>130</b>
<b>附录二 李仁老与陶渊明人格精神之比较</b>	
——以《归去来兮辞》为中心 .....	154
<b>附录三 刘宋琅琊王氏作家考述 .....</b>	<b>165</b>

# 第一章 两晋之际的社会背景与诗歌创作

两晋之际战争频仍，上层统治者互相角逐、残杀，百姓流离失所，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混乱的状态。士人不再奉“忠”“孝”为至上，诗人更没有优游卒岁的社会环境。从晋惠帝统治开始，一部分士人承续了司马炎统治的西晋前期奢侈骄纵的生活方式，一部分士人则由于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而转为贪财好货、积累财富，以寻求内心的安全感。这个时期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社会思想上，社会都处于复杂纠缠的状态，因而，有必要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情况做一下梳理。

## 一 两晋之际的政权更迭

永熙元年（290），晋武帝司马炎驾崩，晋惠帝司马衷即位，由太傅杨骏辅政。杨骏掌权之后滥用职权，行无准则，不分轻重。他自知素无美望，便效仿魏明帝即位的做法，普进封爵以求媚于众。左军将

军傅祗劝杨骏：“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论功者也。”<sup>①</sup> 杨骏全然不听。“丙子，诏中外群臣皆增位一等，预丧事者增二等。二千石已上皆封关中侯，复租调一年。”<sup>②</sup> 散骑常侍石崇、散骑侍郎何攀也上奏，劝谏杨骏：“帝正位东宫二十余年，今承大业，而班赏行爵，优于泰始革命之初及诸将平吴之功，轻重不称。且大晋卜世无穷，今之开制，当垂于后，若有爵必进，则数世之后，莫非公侯矣。”<sup>③</sup> 杨骏仍然不从。杨骏的专权自恣引起了贾南风的不满。元康元年（291），贾后与楚王司马玮合谋杀死了杨骏，但政权却落在了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卫瓘手中。贾后未从中获利，于是又使楚王玮杀汝南王亮，然后反诬楚王玮矫诏擅杀大臣，将玮处死。

从元康元年（291）到永康元年（300），贾后专政。贾后既残暴又荒淫。“初，贾后之为太子妃也，尝以妒，手杀数人，又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堕。”<sup>④</sup> “贾后淫虐日甚，私于太医令程据等；又以簏箱载道上年少入宫，复恐其漏泄，往往杀之。”<sup>⑤</sup> 她的荒淫行径令人发指，甚至连依靠她的亲属贾模都“恐祸及己，甚忧之”<sup>⑥</sup>。元康九年（299），贾后废掉太子司马遹，并在永康元年（300）将其杀死。“太子既废，众情愤怒。”<sup>⑦</sup> 特别是宗室对贾后的专横行径早已心怀不满，于是赵王伦与梁王肜等举兵废杀贾后，并杀了张华、裴頠等人。

永康二年（301），赵王伦废惠帝，自立为帝。司马伦庸愚不堪，凡事都听从于孙秀，使得孙秀威震于朝廷，于是“天下皆事秀而无求

<sup>①</sup>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600页。

<sup>②</sup> 同①，第2601页。

<sup>③</sup> 同②。

<sup>④</sup> 同①，第2604页。

<sup>⑤</sup> 同①，第2628页。

<sup>⑥</sup> 同⑤。

<sup>⑦</sup> 同①，第2638页。

于伦”<sup>①</sup>。“伦及诸子皆顽鄙无识，秀狡黠贪淫，所与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竞荣利，无深谋远略，志趣乖异，互相憎嫉。秀子会为射声校尉，形貌短陋，如奴仆之下者，秀使尚帝女河东公主。”<sup>②</sup>这样的庸愚之人及狡诈之徒掌权，必然会引起群臣共愤。于是齐王冏联合成都王颖、河间王颙、长沙王乂诛伦，扶惠帝复位。政权又落到齐王冏手里，这也是一个纵于声色之徒。“冏耽于宴乐，不入朝见；坐拜百官，符敕三台；选举不均，嬖宠用事。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经冏府，即加考竟。”<sup>③</sup>齐王冏完全沉溺于荒淫享乐之中，不理政事，执政自然不会长久。加之与其一起反叛者不满于司马冏独自操控政权，必会结盟其他宗室群起而攻之。

永宁二年（302），河间王颙联合长沙王乂等举兵攻冏，并杀冏。太安二年（303），河间王颙又联合成都王颖共攻乂，东海王越半路杀入。永兴元年（304），越、颙、颖之间混战；永兴二年（305），越又起兵攻颙、颖。这四年主要由司马颖与司马颙掌权。司马颖骄纵僭侈、不务正业。“颖恃功骄奢，百度弛废，甚于冏时。”<sup>④</sup>“太弟颖僭侈日甚，嬖幸用事，大失众望。”<sup>⑤</sup>司马颖听信谗言、不辨忠良，杀害陆机、陆云兄弟。当孟玖向他进谗言说：“机有二心于长沙。”<sup>⑥</sup>他大怒，便使孙秀率兵杀害陆机，并将陆云下狱。当记室江统、陈留蔡克、颍川枣嵩等上疏，以为“陆机浅谋致败，杀之可也。至于反逆，则众共知其不然。宜先检校机反状，若有征验，诛云等未晚也”<sup>⑦</sup>。司

<sup>①</sup>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642页。

<sup>②</sup> 同①，第2646页。

<sup>③</sup> 同①，第2670-2671页。

<sup>④</sup> 同①，第2683页。

<sup>⑤</sup> 同①，第2695页。

<sup>⑥</sup> 同①，第2688页。

<sup>⑦</sup> 同⑤。

马颖也全然不听，最终还是将陆云也杀了。此外，司马颖最不可原谅之处是他引狼入室，“表匈奴左贤王刘渊为冠军将军，监五部军事，使将兵在邺。渊子聪，骁勇绝人，博涉经史，善属文，弯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师，名士莫不与交。颖以聪为积弩将军”<sup>①</sup>。这直接导致了后来刘渊称帝，胡族肆虐中原。司马颙更是一个优柔寡断、无智无谋之人。“初，太弟中庶子兰陵缪播有宠于司空越；播从弟右卫率胤，太宰颙前妃之弟也。越之起兵，遣播、胤诣长安说颙，令奉帝还洛，约与颙分陕为伯。颙素信回放兄弟，即欲从之。张方自以罪重，恐为诛首，谓颙曰：‘今据形胜之地，国富兵强，奉天子以号令，谁敢不从，奈何拱手受制于人！’颙乃止。及刘乔败，颙惧，欲罢兵，与山东和解。恐张方不从，犹豫未决。”<sup>②</sup> 最后，司马颙决定还是杀死张方并“送方头于司空越以请和”<sup>③</sup>，可司马越并没有领情，也没有停止对司马颙的追击，后来还是将司马颙杀了。

光熙元年（306），司马越攻入长安，杀成都王颖，又毒死惠帝，拥立晋怀帝司马炽，次年春天改元永嘉，至此司马越专政。司马越专权恣肆，杀害异己，失去民心，命将士护卫自己的府中而置朝堂于不顾。“帝之为太弟也，与中庶子缪播亲善，及即位，以播为中书监，缪胤为太仆卿，委以心膂；帝舅散骑常侍王延、尚书何绥、太史令高堂冲，并参机密。越疑朝臣贰于己，刘舆、潘滔劝越悉诛播等。越乃诬播等欲为乱，乙丑，遣平东将军王秉，帅甲士三千入宫，执播等十余人于帝侧，付廷尉，杀之。帝叹息流涕而已。”<sup>④</sup> “太傅越既杀王延

<sup>①</sup>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698页。

<sup>②</sup> 同①，第2717页。

<sup>③</sup> 同①，第2718页。

<sup>④</sup> 同①，第2741页。

等，大失众望。”<sup>①</sup>“越表以行台自随，用太尉衍为军司，朝贤素望，悉为佐吏，名将劲卒，咸入其府。于是宫省无复守卫，荒馑日甚，殿内死人交横；盗贼公行，府寺营署，并掘堑自守。”<sup>②</sup>永嘉五年（311），司马越忧愤成疾，将后事托付于王衍。同年三月，司马越身死于项城，至此“八王之乱”终结。

永宁二年（302），河间王颙联合长沙王乂等举兵攻冏之时，“李雄攻杀汶山太守陈图，遂取郫城”<sup>③</sup>。太安二年（303），河间王颙联合成都王颖共攻乂之时，氐人李雄攻入成都。永兴元年（304），司马颖使匈奴刘渊将兵在邺城，使刘渊的势力壮大起来，最后叛晋，自称汉王，上尊汉高祖与昭烈帝。此时，羯人石勒、王弥，鲜卑慕容族也率军队乘虚流窜，抢劫财富，掳掠汉族少女，蹂躏大河南北。

永嘉二年（308），刘渊自立于平阳，建立汉国。两年后，其子刘聪继立，派刘曜率兵四万攻洛阳。此时在北方抵抗匈奴势力的有刘琨、王浚等人。刘琨使上党太守刘惇帅鲜卑攻壶关，汉镇东将军綦毋达战败亡归。永嘉三年（309），匈奴刘虎与白部鲜卑皆附于汉。“刘琨自将击虎，刘聪遣兵袭晋阳，不克。”<sup>④</sup>之后刘琨又与鲜卑拓跋猗卢结好，表司马越请求出兵讨伐刘聪、石勒，“越忌荀晞及豫州刺史冯嵩，恐为后患，不许”<sup>⑤</sup>。之后，晋怀帝以荀晞讨东海王越。永嘉五年（311），司马越病死，王衍率兵还东海国，为石勒所破，晋军力量大削。之后刘聪又派王弥、刘曜、石勒攻洛阳，城陷，杀王公士民三万余，并携怀帝北去，史称“永嘉之乱”。

<sup>①</sup>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755页。

<sup>②</sup> 同①，第2755页。

<sup>③</sup> 同①，第2682页。

<sup>④</sup> 同①，第2744-2745页。

<sup>⑤</sup> 同①，第2753页。

“永嘉之乱”导致海内大乱，只有江东较为安稳，于是士民多南渡避乱。“镇东司马王导说琅邪王睿收其贤俊，与之共事。睿从之，辟掾属百余人，时人谓之百六掾。以前颍川太守勃海刁协为军咨祭酒，前东海太守王承、广陵相卞壶为从事中郎，江宁令诸葛恢、历阳参军陈国陈頵为行参军，前太傅掾庾亮为西曹掾。”<sup>①</sup> 晋怀帝被掳去之后，“汉主刘聪封帝为会稽郡公，加仪同三司。聪从容谓帝曰：‘卿昔为豫章王，朕与王武子造卿，武子称朕于卿，卿言闻其名久矣，赠朕柘弓银研，卿颇记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尔日不早识龙颜！’聪曰：‘卿家骨肉何相残如此？’帝曰：‘大汉将应天受命，故为陛下自相驱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业，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sup>②</sup> 且不说君臣位置的互调使晋怀帝心中所产生的落差，单说他为了苟活于世而不得不向逼害自己的仇人谄媚，其中的滋味可想而知。建兴元年（313）正月，汉主刘聪在极光殿宴请群臣，竟使晋怀帝着青衣行酒，故旧大臣庾珉、王俊等备感委屈悲愤，因此号哭起来。刘聪也因此而反感起他们。同年二月刘聪杀死了珉、俊等故晋臣十余人，怀帝亦遇害。同年四月，怀帝遇害消息传到长安，司马邺遂登位为愍帝，改元建兴，都长安。“是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车四乘，百官无章服、印绶，唯桑版署号而已。”<sup>③</sup> 建兴四年（316），匈奴刘曜攻陷长安，愍帝出降，被掳至平阳，至是西晋亡。“司空长史李弘也以并州降石勒。刘琨进退失据，不知所为，段匹磾遣信邀之，已未，琨帅众从飞狐奔蓟。匹磾见琨，甚相亲重，与之结婚，约为兄弟。”<sup>④</sup> 二人期以翼戴晋室。

<sup>①</sup>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766页。

<sup>②</sup> 同①，第2777-2778页。

<sup>③</sup> 同①，第2794页。

<sup>④</sup> 同①，第2838-2839页。

等，大失众望。”<sup>①</sup>“越表以行台自随，用太尉衍为军司，朝贤素望，悉为佐吏，名将劲卒，咸入其府。于是宫省无复守卫，荒馑日甚，殿内死人交横；盗贼公行，府寺营署，并掘堑自守。”<sup>②</sup>永嘉五年（311），司马越忧愤成疾，将后事托付于王衍。同年三月，司马越身死于项城，至此“八王之乱”终结。

永宁二年（302），河间王颙联合长沙王乂等举兵攻冏之时，“李雄攻杀汶山太守陈图，遂取郫城”<sup>③</sup>。太安二年（303），河间王颙联合成都王颖共攻乂之时，氐人李雄攻入成都。永兴元年（304），司马颖使匈奴刘渊将兵在邺城，使刘渊的势力壮大起来，最后叛晋，自称汉王，上尊汉高祖与昭烈帝。此时，羯人石勒、王弥，鲜卑慕容族也率军队乘虚流窜，抢劫财富，掳掠汉族少女，蹂躏大河南北。

永嘉二年（308），刘渊自立于平阳，建立汉国。两年后，其子刘聪继立，派刘曜率兵四万攻洛阳。此时在北方抵抗匈奴势力的有刘琨、王浚等人。刘琨使上党太守刘惇帅鲜卑攻壶关，汉镇东将军綦毋达战败亡归。永嘉三年（309），匈奴刘虎与白部鲜卑皆附于汉。“刘琨自将击虎，刘聪遣兵袭晋阳，不克。”<sup>④</sup>之后刘琨又与鲜卑拓跋猗卢结好，表司马越请求出兵讨伐刘聪、石勒，“越忌荀晞及豫州刺史冯嵩，恐为后患，不许”<sup>⑤</sup>。之后，晋怀帝以荀晞讨东海王越。永嘉五年（311），司马越病死，王衍率兵还东海国，为石勒所破，晋军力量大削。之后刘聪又派王弥、刘曜、石勒攻洛阳，城陷，杀王公士民三万余，并掳怀帝北去，史称“永嘉之乱”。

<sup>①</sup>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6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755页。

<sup>②</sup> 同①，第2755页。

<sup>③</sup> 同①，第2682页。

<sup>④</sup> 同①，第2744-2745页。

<sup>⑤</sup> 同①，第2753页。

岸被温峤所败，王敦听到兵败之消息大怒，病情加重，寻卒。王敦之死使得晋军大振，沈充、钱凤接连战败，并在战斗中被杀；王含、王应父子二人逃到荆州投奔荆州刺史王舒，王舒最后将王含、王应沉入江中淹死，由此王敦叛乱终结。太宁三年（325），晋明帝司马绍驾崩。

通过对两晋之际政权更迭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此时期的政治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政权易主时间快。先看西晋后期，自晋武帝司马炎死后杨骏专权一年，贾后专权十年，赵王伦掌权一年，齐王冏掌权一年，长沙王乂、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共掌权四年，东海王越掌权六年。再看东晋，晋元帝司马睿掌权六年，司马绍掌权四年。从这几位掌权者专权时间来看，除了贾后时间稍长一点外，其他时间都不长。那为什么政权易主这么快？先看西晋，从统治者角度来说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晋武帝司马炎在位之时就已开始怠政，平吴战争胜利后，武帝“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sup>①</sup>，于是让杨骏等外戚有机可乘。第二，惠帝“不慧”，使得宗室外戚专权膨胀。惠帝在华林园听到蛤蟆，竟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sup>②</sup> 在百姓无粟米充饥之时，竟问道：“何不食肉糜？”<sup>③</sup> 这样一个昏庸皇帝根本不能掌控、平衡局面，所以才使得宗室和外戚权力膨胀，互相争斗。第三，从掌权的宗室来看，无论是赵王伦、齐王冏还是长沙王乂、河间王颙、成都王颖、东海王越都是庸愚之人，其人格气质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杀害异己，骄横恣肆，耽于享乐，不理朝政，委用奸佞小人，使得百业弛废，大失众望。而贾后之所以能专权

<sup>①</sup> (唐)房玄龄：《晋书》第1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0页。

<sup>②</sup> 同①，第108页。

<sup>③</sup> 同②。

时间稍长一点，是因为其专权时期在朝堂之上士族、庶族、外戚的力量达到了暂时的平衡。“贾谧与后共谋，以张华庶族，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欲倚以朝纲。疑而未决，以问裴𬱟，𬱟素重华，深赞其事。华遂尽忠匡辅，弥缝补阙，虽当暗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sup>①</sup> 张华、裴𬱟皆儒雅正直、深谋远虑之人，他们掌管机要、尽忠晋室，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上层统治者的浮华荒淫之风，也按捺住了欲兴风作浪之人的蠢蠢欲动之心，使得摇摇欲坠的晋室获得了短暂的稳定。

再看东晋初期，晋元帝司马睿、晋明帝司马绍统治时间较短的原因有如下几点：（1）刚刚南渡之后，晋元帝所面临的是内忧外患。“二年春正月丁卯，崇阳陵毁，帝素服哭三日；使冠军将军梁堪、守太常马龟等修复山陵。迎梓宫于平阳，不克而还。”<sup>②</sup> “夏四月，龙骧将军陈川以浚仪叛。降于石勒。太山太守徐龛以郡叛，自号兗州刺史，寇济岱。秦州刺史陈安叛，降于刘曜。”<sup>③</sup> “五月癸丑，太阳陵毁，帝素服哭三日。徐杨及江西诸郡蝗。吴郡大饥。平北将军祖逖及石勒将石季龙战于浚仪，王师败绩。”<sup>④</sup> 在内是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天下凋敝，加以灾荒，百姓困穷，国用并匱，吴郡饥人死者百数”<sup>⑤</sup>；在外被刘渊、石勒、慕容廆等步步紧逼，而晋元帝的军队一败再败，甚至投降叛变到敌军，这使晋元帝绝望透顶了。之后石勒攻陷襄城、城父，保卫围谯，攻破祖约别军。终于，晋元帝在闰月因忧愤而病死。（2）王敦谋反催化了晋明帝统治的终结。太宁元年（323），

<sup>①</sup> （唐）房玄龄：《晋书》第4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72页。

<sup>②</sup> （唐）房玄龄：《晋书》第1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1页。

<sup>③</sup> 同②，第151-152页。

<sup>④</sup> 同②，第152页。

<sup>⑤</sup> 同④。